

族蒙羞、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共同患难经历直接催生了各族人民对“我是谁”身份的审思与确证。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大愿景又成为这种愿景的延续，在过去与未来的时空场域中，“我是谁”则是当下共同生活的直接体认归属，是对共同情感利益与价值追求的需求与承认，是汇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磅礴力量的重要基石。

文化认同的前世：“我们从哪里来”的历史回望

在时间的历史坐标系里，历史是我们审思和追问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把金钥匙。我从哪里来？走过了什么样的历程？诚然是人民必须加以思考和探索的“历史之问”。纵观世界各个民族或是国家，凡是未对这一“历史之问”作出清醒而又明确回答的，最终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故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纵观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一方面，各民族在长时段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为各族人民创造了共同生活的精神家园空间环境；各民族共同书写了辉煌的历史，为各族人民群众滋养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各族人民提供了久远的伴随感；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为各族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基因；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的历久弥新的伟大精神，为各族人民群众天然预设了认同的“发酵剂”。这是中华民族之所以繁衍生息、虽历经苦难而不断强大的深层动因。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曾维系其自身数千年的文化信仰系统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无情摧毁下逐渐走向瓦解，进而造成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最为剧烈最为深刻的危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所衍生的“文明永恒高于四裔”的文化优越感和文明自信心逐渐以“缺场”的姿态呈现。可以说，近代以来列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最直白抑或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便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窘境，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和自卑感。最终，各族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之下在中华民族身份与角色的根本性问题上持续展开了艰辛探索。

在接续探索的历史图景中锻造孕育出了红色革命文化，这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解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生存性危机，特别是中华民族重新树立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所在。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

中，其中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就是如何增强各族人民群众对“我从哪里来”的自我经历的追思与体味，时刻对红色革命文化及其所蕴含的深刻历史记忆进行回望与确认。唯有如此，方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更好地校正自己的行动坐标，才能筑牢全国各族人民群众情感认同的根基，最终方能达到各族人民群众价值认同的历史效果，从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助力。

文化认同的今生：明晰人民对“我们到哪里去”自我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这句话本质上就是关系到一个民族抑或是国家存亡延续的问题。就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其首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出发，其首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用大历史观系统审视和辩证理解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现实境遇直接造成了中华民族原有民族优越感的荡然无存。基于此，“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质言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牵引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坐标系”和动力源，也是各族人民群众对“我们到哪里去”的有力回应。

然而，实现民族复兴在百年来的时空场域中彰显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苦难与辉煌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新场景中，“我们到哪里去”的时代之问面临着全新的要求与挑战，这也是我们当前强调文化认同的重要考量所在。

文化认同是凝聚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强大精神纽带，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而且是最深层、最持久、最重要的基础，离开高度的文化认同，就没有基本的文化自信，更就不清楚“我们到哪里去”的目标航向。因此，要从历史的情境走向当代，在当代中国最生动、最伟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群众文化认同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作者简介

郑嘉禹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